

论外语课堂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式

——兼评四项外语课堂研究

邹为诚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62)

摘要: 本文介绍了外语课堂研究的基本定义、理论基础以及四类研究范式。现代外语课堂研究有两种指导理论,一种是科学主义的逻辑实证观,简称为“简单系统”,此对立的是“复杂系统”哲学观。在这两种哲学观之下,外语课堂研究可以依据“干预”和“结构”分为四类研究。据此理论,本文对这个专栏内的四篇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了评述,虽然这些研究还有种种局限性,但在我国当下为数不多的研究中,他们的贡献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他们的研究结论,值得我国外语教学界深思。

关键词: 外语课堂研究; 逻辑实证主义; 复杂系统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17)04-0001-06

1. 引言

课堂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对课堂内的教学实践的研究,但是我们对课堂的定义不必拘泥于课堂的物理形态,可以把课堂研究的概念用于任何一项由学习者、教育者、和环境所构成的学习能够发生的场合。因此,我们所说的课堂研究具有广义的性质,“村口的一棵大树可能就是一个课堂”。以此类推,外语课堂研究就是指开展外语教学或者与此有关的教学的课堂的研究。

2. 课堂研究的哲学观

课堂研究的有两种对立的哲学观:第一种是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这种哲学观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性的,有序的,变量间存在着确定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是可以重复实验的方法来验证的。在课堂教学中,学习的各种变量是可控的,可以观察到的,并且可以测量,这些变量可以预测学习结果(Reich et al, 2016)。这种哲学观来源于自然科学,今天仍然是课堂研究中的重要指导思想,也被认为是最“严谨”的课堂研究观念之一。

第二种哲学观与此对立,被称为“复杂系统”理论。复杂系统理论认为,来源于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简单系统,不适合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的情况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社会科学不仅变量众多,而且变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例如简单系统往往默认动机的提升会导致学习结果的提升,但是在现实课堂中,学习动机和其它变量和环境之间存在的复杂的关系,动机和学习结果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又如中国教育界特别看重“公开课比赛”,默认好看的教学就一定会导致学习发生。但是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公开课虽然好看,却不一定导致学习发生。教师有句俗语,“好看的(课)不一定

作者简介: 邹为诚 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语言学。作者邮箱:wei_chengz@hotmail.com

“不管用,管用的(课)不一定好看。”

这两种对立的哲学观与课堂研究有关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下表[根据 Horn(2008) 改写, 转自 Ahmadian & Tavakoli 2011]。

简单系统	复杂系统
认为研究结果是可以复制的,可重复的。	认为研究结果不一定可以复制和重复。
认为系统可以分解为若干数量的可控变量。	认为系统是各个变量都发挥作用的一个整体。
认为系统是线性的,因而结果是可预测的。	认为变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结果难以预测。
认为结果是确定的。	认为结果是不确定的。
认为可以将客体从环境中分离出来。	强调环境的重要性,变量与环境有着潜在的互动关系。
采用二元对立论,把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分离开来。	认为观察者是场景中的元素之一,坚持“相对客观性”(inter-objectivity)。
认为矛盾意味着错误,必须予以清除。	认为矛盾是合理的存在,受到欢迎。
采用单一的逻辑思维方式。	采用对话和辩证的思维方式。

复杂系统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哲学观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但是,这一新兴的理论并不完善,目前还存在着一些挑战。例如,复杂系统理论常常被人误解成一种“规定性理论”,其实复杂系统理论只是一种描写理论(Morrison 2008)。规定性理论对具体的研究设计具有规定性,研究者必须受其制约,否则其结果将不被科学界接受。但是描述性理论不具有这种特性,因而对研究不具有约束力,研究者需要有更加具体的理论作为研究指导。

3. 课堂研究类型

课堂研究并没有固定的范式,其种类因受多个因素的影响而不同。课堂研究除了受到两种哲学观的影响外,还受到另外两个重要变量的影响——“干预(Intervention)”和“结构”(Structure)。干预指教师在教学中改变之前的习以为常的教学手段,使得教学能够发生变化。结构指教师对教学的流程进行特殊的设计,使之有别于之前学生所习惯的教学过程。综合这两个变量和两种哲学观,借用 van Lier (转自 Freeman ,1998: 32) 提出的教师研究框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课堂研究种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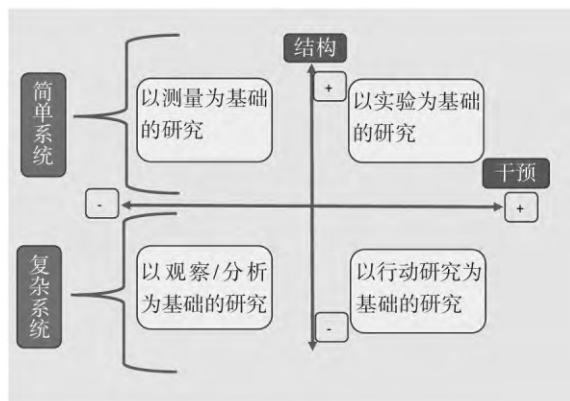


图1 课堂研究的类型

在上述研究类型框架中,简单系统指传统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观,根据这种观点,课堂研究的变量必须加以筛选和控制,教学必须有一定的结构化(结构+),如果干预手段为+,

表示教师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教学手段,如果干预手段为 -,表示教师没有对教学进行干预。典型的研究是“控制式实验”(controlled experiment)和“测量调查”(measuring by surveys, questionnaires, etc.)。

图1还表明,在复杂系统中,课堂研究所面对的是多变量和开放式的环境,教学结构化很弱(结构-)。这种情况可以分为有干预和没有干预的两类课堂研究。前者反映了教师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发现问题,提出假设,然后开展教学改革,这些教学手段的变化体现了课堂干预,教师在这个探索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改进教学,这可能是一个循环递进的过程,因此,没有明显的教学结构,典型的研究就是“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第二种情况是教学没有结构,同时也没有干预(-),例如,研究者试图通过描述、调查、叙事、观察等手段客观地描述出课堂的内部情况,帮助我们理解课堂内部的运行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研究有文化人种志(ethnography)、个案研究(case study)、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和会话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等研究(ahmadian & Tavakoli 2011)。

4. 本期研究评述

本期所发表的文章起源于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自2012至2017年的英语师范本科综合课程改革,在这次改革中,华东师大英语系的许多教师积极投入到教学研究中,本期发表的四篇论文集中代表了两个哲学观视野下的四类研究。

(1) 合作产出对英语书面语准确性发展的影响研究

这是一项典型的控制变量的实验研究。合作产出(Joint Production)是本研究的主要干预手段,其含义是指教师利用学生在讲述和归纳阅读内容时采用互动的方式向学生提供反馈,启发学生修正语言错误和拓展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教师一边和学生互动,一边把修改的语言写在黑板上,此时,学生得以专注于思想、观点和表达的条理性,同时在教师的启发下修正语言或者看教师是如何修正语言的。

这项研究的教学结构十分明显。分析其教学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学生首先要完成阅读任务,然后要向教师和同学做口头汇报,教师在这个过程中用互动的方式和学生开展意义协商,然后教师帮助学生修正语言,将修正的语言写在黑板上,学生不仅听到教师的修改,还能看到教师修改以后的语言,每次课后,学生要写一篇长约200多字的短文。教师连续收集学生的书面语作品,通过分析其中的词语和语法等特征,评估书面语的准确性。

作为变量控制手段,研究者选取了两个起始阶段语言水平大体相当的班级(前测结果),控制班在阅读任务和写作任务方面和实验班维持一致的教学结构,唯一的差异是缺乏合作产出的干预手段。最后研究者也是通过分析控制班写作作品的词汇和句法等特征来判断语言的准确性。实验表明,合作产出确实具有提升书面语准确性的效果。这个结论是在严格的变量控制下取得的,因而,这项研究体现了“简单系统”的哲学观。

如果用复杂理论来分析这项研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研究的局限性。例如,作者没有考虑教师的写作能力对学生的影响。换句话说,不同写作水平的教师可能在实施“合作产出”时有不同的教学水平,由此形成一个新的变量,研究的结果由此变得扑朔迷离,难以预测。

(2) 高级语法课程的预设变量研究

这项课堂研究有些特殊。特殊之一,作者有两个研究目标;特殊之二,作者的研究哲学观跨界,分别采用了“复杂系统”观念(用于指导目标一的研究)和“简单系统”观念(用于指导目标二的研究)。

高级英语语法课程是大学英语专业都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教授基本的英语语法体系,但是由于我国基础教育语法教学的偏差,大部分英语专业的学生都对英语语法持有各种不准确的概念,最典型的是语法知识的绝对化。教师希望引导学生认识到语用和语法知识的复杂关系,建立新的语法认知体系。此外,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用英语学习英语语法是一项基本要求。在这些目标的引导下,作者试图完成两项研究,第一是这些大规模的教学内容的调整是否适合学生,研究之二是学生是否可以采用更加民主的方式来发现语法知识和语用之间的复杂关系。

很显然,这两个目标不在同一个哲学观之内。第一个目标采用尝试调整的方式,为此,作者对学生做了连续三年的调整,这种针对特定类别的学生的调整是为了应对教学中的不平衡状态(Disequilibrium),这是复杂系统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教师持之以恒地对教学情景问题化,追求动态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这个情况像群飞的大雁,看似队形一直在变,但是在运动中,整个雁群呈现出不同的规则队形。我们可以把这个目标的研究称为“行动研究”。在这个研究中,教师有干预(调整教学内容、课时等),干预的结果反映在调查问卷中。但是没有对课堂进行结构化处理,也没有控制变量。

在第二个目标中,作者要探讨的问题是研究学生是否可以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来评价他们自己对语法的认识,改变师生的角色。作者设计了一个活动,给她的课堂教学赋予了结构化的特征。作者设计了学生互评的活动,看起来似乎是教学干预,但是作者没有测量学生在教学干预情况下的学习结果,而是重在判断学生是否能够公平地评价学习,因此,这个干预的结果并不是作者研究的对象,作者仅仅观察学生的评价过程和结果,因此,这个干预不能算是本研究的干预。作者在活动中对评分的变量和可能影响评价质量的变量进行了测量,并且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做了质性的验证。数据分析表明,学生非常认可同学们对自己的评价,这一研究结论加深了我们对语法课中学生评价的过程和特点的认识,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群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对语法学习的评价。这是对我国大学英语专业语法教学的一个贡献,其研究方法体现了“简单系统”的哲学观,是一项以测量为主的研究。

这篇文章混合了两种哲学观,说明课堂研究并不是那么整齐划一的,课堂是一个内部非常复杂的系统,采用什么哲学观要视研究者所面临的问题性质而定。

在本课题中,两个研究目标并不平衡。第一个目标聚焦于教学内容、时间等调整。这些思考和探索是教师的基本要求,仅仅是教学探索的起步,这一部分的研究没有能够揭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内容、时间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他们学习因而需要做出调整的。第二个研究目标采用了科学主义的逻辑实证思想,通过变量的测量和数据分析,有效地证明了学生互评的有效性,这对于我国语法课程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3) 语言学导论教学重点的调整——一项基于新中两国的对比研究



该研究报告了一位语言学导论课程的教师的教学改革过程,作者同时执教英语系的实验班和普通班(对照班)。在三年的教学改革中,作者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如何让教学内容调整到满足学生的需要上。

行动研究的基本特点是教学结构化程度很低,教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教学干预,摸索出恰当的教学策略。因此,这项研究的背后是“复杂系统”的哲学观。

行动研究需要考虑四个问题:第一,教学环境。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很好地交代了普通语言学导论课程的教学环境,其中还包括教师个人在新加坡的教学经历。第二,焦点问题。本文聚集于如何根据中国学生的需要调整教学内容。第三,调查过程。本文报告了多层次的调查工作,譬如对国内和新加坡语言学教师的访谈,对研究生焦点小组的访谈,对学生的访谈。第二个层面的研究体现在连续三年的课堂尝试中,作者把两类学生作为对比,分析他们在调整后的学习内容。第四,研究者的反思。作者在文章的结论中对这个行动研究开展了反思,作者提出,语言学知识必须和学生在提升语言能力方面的需要结合起来,这个观点令人深思,这对我国的语言学教材和课程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该研究仅仅考虑了课程本身内容的调整,没有考虑实验班和对照班所用的课程大纲是不同的。由于不同的课程大纲,学生所具备的背景知识就不同,这种差异一定会影响到语言学课程的目标取向和学习过程。例如英语专业通常还会开设其他语言学类别的选修课,如文体学、词汇学、语音学、二语习得等等。如果这些课程成为语言学导论的先修课,则一定会对本课程的内容和难易程度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目标和对难易度的感受。因此,在专业性质的课程行动研究中,学生的课程大纲最好能够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课程结构是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4) 教育实习过程中师范生实践性知识初始特征探析

该文是师范生的实践性知识习得研究。尽管作者不是课堂的教学中者(既不是中小学里的实习生指导教师,也不是高校派出的指导教师),作者以研究者的身份对学生的实习过程进行调查,采用的方法是调查问卷和师生访谈,因此,这可以看作是一项以观察调查为主的研究。作者既没有对课堂进行结构化处理,也没有对实习过程实施干预,其背后是“复杂系统”的哲学观。

作者的研究目标是调查学生的实践性知识在初始阶段的特点。由于实践性知识的缄默性、个性化等特点,作者无法用实验变量的方法对其控制和对比,她只能依赖主管的观察和学生教师的主观报告以及访谈来推测实践性知识的初级阶段的特点。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的实习制度并不利于实习生实践性知识的形成,学生在长达12周的时间内,基本只能获得非常初步的知识,如教学流程。其背后是不合理的实习制度,例如实习指导教师并不懂得如何指导新教师,她们要么凭资历,要么是学校授权,堂而皇之地充当了实习生的指导教师,这是典型的“瞎子领瞎子”的做法。他们不懂的实践性知识生成的条件是让实习生参与教学,让他们上课、把他们当成一个初级教师,让他们获得身份感,这些都是实习指导教师要给予保证的学习机会。但是非常遗憾,我们看到目前的实习制度剥夺了新教师的学习机会,实习生的教学课时平均只有2.9节,这种实习质量令人震惊。这项研究有效地揭示了我们实习

制度存在的问题,值得我国教师教育者深思。

5. 结论

外语课堂教学是我国外语学习的主要场所,因此对外语课堂研究在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课堂研究在我国并不多见,因此,提倡教师开展外语课堂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本文所展示的研究分别代表了外语课堂研究的两种哲学观和四类研究,这些研究是我国最近几年里研究质量比较高的例子,虽然它们还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是它们所获得的结论值得我国外语教学界深思。

参考文献:

- [1]Ahmadian ,M. & M. Tavakoli. 2011. Exploring the utility of action research to investigate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s as complex systems [J]. *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 (2) : 121 – 136.
- [2]Freeman ,D. 1998. *Doing Teacher Research: From Inquiry to Understanding*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3]Morrison ,K. 2008.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 challenge of complexity theory [J].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1) : 19 – 34.
- [4]Reich ,K. ,J. & Garrison S. Neubert ,2016. Complexity and reductionism i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 John Dewey ’s critical approach in “Democracy and Education”reconsidered [J].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10) : 997 – 1012.

《外语与外语教学》郑重声明

近期,我刊接到作者反映,有人以“《外语与外语教学》稿件审阅与录用”为幌子,要求作者在收到用稿通知后汇款至某个银行的某个账号。为此我刊郑重声明:

- 一、我刊从不对作者收取任何费用。
- 二、任何盗用我刊名义、伪造印章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我们已就此向有关部门举报。
- 三、希望广大作者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